

戴炜栋

英语教育
自选集

戴炜栋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戴炜栋英语教育自选集

Dai Weido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戴炜栋

英语教育 自选集

戴炜栋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戴炜栋英语教育自选集

Dai Weido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炜栋英语教育自选集 = Dai Weido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戴炜栋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12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 - 7 - 5600 - 7146 - 6

I. 戴… II. 戴…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3885 号

出版人: 于春迟

选题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执行编辑: 史丽娜

封面设计: 袁璐

封面题字: 赵发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7.75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00 - 7146 - 6

定价: 4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10本，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

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和期号（或出版社名）。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如演讲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 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 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 划 刘相东

序

迄今为止，我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外语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近10余年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而我国加入WTO、申奥和申博的重大成功等对外语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适应时代需求，培养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一方面以史为鉴，另一方面博古通今。培根在《论读书》中谈到，读史使人明智。为了更好地解读今日的英语教学，有必要了解我国外语教育的重大历史事件，明确我国英语教育的不同阶段。在通晓历史的同时，我们还应将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把握最新的英语教学研究动向。而所有这些都能够在戴炜栋教授这部《自选集》中找到。

在这部集子里，戴炜栋教授与业内同行分享了自己的所思所行、所感所悟，以使读者了解应用语言学的相关领域研究和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趋势。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我反复阅读了《自选集》，感触良多，主要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仿佛走过了一个历史长廊，感悟到不同教学理论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教学管理的影响，以及我们的专家学者为了繁荣我国外语教育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自选集》共收录了作者自1965年以来的5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发表于1995—2005年。其内涵丰富、见解独到，涉及到学科规划、教学理念、教学计划与大纲、专业英语测试、教学模式、二语习得理论、社会语言学理论、网络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层面；涵

盖了我国外语教育过程中的重大改革，如“听说领先试点”、“基础阶段分级教学”、“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制订”、“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大中小学‘一条龙’英语教学体系”等。从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历史发展的轨迹，如受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影响推行听说领先；针对个体差异进行分级教学；适应社会经济需求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等。这将有助于学界人士梳理历史脉络，提高认识的全面性。

第二，我进一步意识到应用语言学作为语言理论与教学实践之媒介的重要性，体会到这一领域的广泛用途与光辉前景。大家知道，应用语言学作为沟通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的桥梁，主要对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阐释并将其运用到语言教学实践中去。该学科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在60年代中叶得以发展。长期以来，在外语界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教学类科研项目 and 论文也往往被认为缺乏学术性和理论深度。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以教学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走纯文学、纯语言学研究的路子。这种现象一方面与某些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偏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教学类论文本身的理论性不足有关。而戴炜栋教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为依据，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有效结论，并进一步运用到教学中去。这对于广大教师进行教学研究，解答研究中 why、what、how 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同时，我国英语教学地域差异和个体差异等比较明显，广大教师可以在充分考虑学习者层次、性别、年龄等不同因素的基础上，探求适合教学实际的学习模式。这一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第三，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位严谨治学、勇于创新、恪尽职守、诲人不倦、与人为善的学者形象。其为人、为学都值得学界同仁学习。

戴炜栋教授勤奋刻苦、治学严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的一次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戴

炜栋教授，感到这位刚从新西兰访学归来的学者年富力强、才思敏捷。我们一见如故，就语言学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谈起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来如数家珍，告诉我他在国外搜集了几箱子的理论书籍和资料，并做了许多读书笔记，这让我很钦佩。看他的文章，尤其是调查性别差异、个人语言特点、填空词等方面的研究，处处反映出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他主编的词典如《英语搭配词典》、《汉英综合辞典》、《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等也以其准确性、实用性深受广大师生欢迎和好评。

戴炜栋教授勇于创新、锐意改革。这主要体现在教育教学改革和科研创新两个方面。多年来，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戴炜栋教授作为教育部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其他委员和专家们合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专业教学大纲，四、八级考试大纲，英语专业本科评估方案等，对我国英语教学管理产生很大影响。有时和戴炜栋教授谈起改革的动因，他总是指出任何理论必须与教学实际相结合，适应社会需求，这样才能突出其创新性和时代性。

戴炜栋教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在历任上外基础教研室主任、英语系主任、校长的过程中，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研究任务外，还担负着学校行政职责，同时在教育部兼职，工作非常繁忙。我于1996年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211工程”的部门预审，亲眼目睹了他在不同部门穿梭、协调整体发展的辛苦奔波，也听到他有时为了与相关职能部门商讨问题而拿方便面当午餐的经历，的确确实感受到他的敬业和牺牲精神。正是在他及其同事的不懈努力下，上外逐步由一个单科性外语学院发展成为一个文、经、法、理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外国语大学，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扩大。

戴炜栋教授对学生严格要求、诲人不倦。他经常教育博士研究生们要经得住外界诱惑，静心做学问，深入思考，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也是我深为赞同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

就一直参加他的博士生答辩，总体感觉这些学生基本功扎实、学习态度严谨。据他的博士生说，每篇论文的框架结构、段落调整、文字措辞等戴炜栋老师都要耗神费力给他们耐心指导。我有一次春节期间给他打电话，他老伴沈老师接的电话，说他还在忙着看论文，也顾不上休息，结果看完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头都要痛很久。这样劳心费力地教导学生体现出他所一贯坚持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原则。

戴炜栋教授在待人接物时总是和蔼可亲、亲切友好。我们曾经在教育部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共事 10 余年。大家一致认为他谦虚谨慎，具有大家风范。在处理问题时能够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并予以综合，最后拿出最有效的解决措施。他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和他所在的上外相距不远，多年来我们经常通过面谈、电话、电邮等形式交流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悟，彼此深受启发。

屈指算来，我与戴炜栋教授相识已经 20 余载，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承老友厚情，让我为他的《自选集》写篇序言。欣然从命之余，落笔又觉踌躇。多年来我见证了他教书育人、做学问等方面的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拜读了他不同时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分享了他的不少睿智之见。若将种种感触浓缩在一篇短文里，难免挂一漏万。所以涂来改去，写成以上文字。言之未尽之处还请老友和读者见谅了。

陆国强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 年秋于上海

任重道远 上下求索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接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通知，告知我入选《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系列丛书，并让我撰写《我与中国英语教育》的自序。这让我有机会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经历，也谈谈自己关于外语教育教学的一些看法。我自1958年开始学习英语，1962年任教，一晃47年过去了。当时初出茅庐的青年不觉已两鬓华发，而我国的英语教育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抚今追昔，不由感慨万千，不胜唏嘘。

一、蹉跎求学路 而今重回首

我于1958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名上海外国语学院），属于学院第一届正式招收的英语专业学生。大家知道，自解放初到1956年，我国俄语教学蓬勃发展。当时全国除了7所俄语专科学校以外，还有17所综合性大学、19所高等师范院校都设有俄语专科。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就是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与之相比，英语教学点处于紧缩状态。1952年至1953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后，只剩下7个英语教学点。一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出“扩大外语教学”的指示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等才分别改称学院，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等专业。1958年夏天，我在上海第55中学高中毕业。因为中学学的是俄语，而且成绩优秀，所以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当时考得很好，可是受家庭成分影响，被录取到英语专业就读。当年，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一次正式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英语专业学生，这阴差阳错地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

入学后，我面临着学习上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作为对英语一无所知的“零起点”的学生，跟那些中学已经学过英语的同学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加上当时全国上下受“左倾”思想影响，各行各业强

调“大跃进”，开展“教育大革命”，我们被要求在两天内学完语音，两周内学完语法，每周突击 300 个单词，而且政治词汇比较多，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当时学习条件也比较艰苦，基本上没有外籍教师，没有语音室，也没有好的视听设备；教材和图书资料也很匮乏。那种条件与今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气馁，心里想着：一定要努力学习，决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语言是相通的，既然我能学好俄语，也就能学好英语。抱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每天进行音标训练、英语阅读、收听新闻等学习活动。当时为了练一个音，曾经反复对着镜子读好多遍，嗓子都哑了。而晚上在图书馆常常学到那个看门的老师傅摇铃关门。冬天的上海很冷，记笔记时不得不写几个字就停下来暖暖手；而夏日的上海酷热难忍，读几页书就要擦擦额头上的汗；可是我还是坚持不懈，认真阅读。就这样，在一年内，我几乎读完了图书馆内所有的英语简易读物。还记得为了练习听力，我将阅读和听音相结合。先查看中文报刊中的新闻要点，了解相关单词和短语，然后抱着收音机听时事新闻。当时没有 BBC 和 VOA 可以听，只能听听 Radio Beijing。而我的小收音机功能较差，为了获得好的收听效果，常常要把收音机放在耳边反复听。我习惯于边听边写，争取把听到的词句都写下来。这样与读过的中文新闻相对比，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当时为了提高阅读能力，天天去泡图书馆。那时，图书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英语杂志只有 *Beijing Review*、*China Reconstruction* 和新华社电讯稿等；而英语简易读物多是前苏联出的英美文学简易本，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老师加上中文注释，有《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雅典的泰门》、《远大前程》、《茶花女》等。这些我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的时候先试着区分重要的词汇和用法，记到本子上，然后再查字典，将相关解释都写下来，加上例句。笔记本我随身带着，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背诵里面的内容，这样在应用时就能够做到举一反三了。为了提高口语能力，我不仅自己模仿收音机和老式唱片上的发音，还常常和其他同学结成对子，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练习。当时，我们班上有些同学小时候与外国人接触比较多，口语表达能力较好。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用英语交谈，培养自己的语感。现在想来，虽然当时不太了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也不大懂什么认知科学，但还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等相关原理，提高了学习效率。

回想起来，当时的学习条件的确艰苦。一方面有的学生受“左倾”思想影响，强调“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坚持思想上要插上红旗，拔掉白旗，所以积极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就会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我自己就曾因为“上课下课拿着书看”而被人讽刺批评过。另一方面教学条件比较差，图书音像资料少，教学方法过于传统。但是，我自己通过有意识的、大量的听、读、说、写等练习，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入学半年以后，我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尖子生；一年之后，成为年级第一名，此后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上二年级时，学校领导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提出英语专业“二赶四”的口号，即两年学完四年的内容，提前达到毕业要求。为了证实这一点，特地从二年级选拔了两个“尖子生”和四年级两个成绩最差的学生用同一张试卷进行考试，我代表二年级参加了竞赛。还记得当时考的是综合能力，涉及到听、说、读、写等内容。结果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四年级学生，顿时成了学校的名人；并且在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参与编写三年级的阅读教材。这赢得了许多同学的羡慕和钦佩。他们很奇怪我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好了英语。其实，古语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以说，我最初学习英语主要是凭借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除了勤学苦练、多记笔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捷径。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用过的一本辞典，是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的由葛传槿先生编写的《英语惯用法辞典》，虽然小却非常实用。当时这本辞典几乎被我翻烂了，上面全是勾勾划划的痕迹，最后不得不到福州路外文书店附近的装裱店里重新装订。店里的师傅把封皮换掉后，又重新裁边，我那本辞典也算是旧貌换了新颜。

大学生涯对于人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我很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些非常认真负责、富有敬业精神的大学老师。他们恪尽职守，每天都来学校上班，认真倾听我们的困惑，耐心解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还记得有位钱维藩老师，解放前在外国人办的报社里做编辑。他的英文很好，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我喜欢写点读书报告之类的文章，便拿去请教他。他一句句地圈点，标出写得好的地方，指出不足之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老师不仅在学业上指导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我们。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不太好，男同学每月定量27—28斤（13.5—14千克）粮食，女同学则只有23—24斤（11.5—12千克）粮食，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远远不够。考试的时候食堂加餐，给

每位同学定量一碗豆浆和一个油饼，那已经是无上的美味了。老师们的条件也不好，他们每月只有一张点心票，每月的粮票也是定量的。即便这样，到我们开“中秋晚会”、“元旦晚会”时，他们总会用省下的点心票买点饼干或者糖块，和我们一起欢庆节日，让远离父母的我们感受到了老师的无限关爱。如果哪位同学生病了，没能上课，老师（特别是精读课老师）总能注意到这一点，下课后就到我们住的小平房里（现在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所在地）看望，或者做点好吃的带过来，让我们倍感家的温暖。我们生活、学习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也总会找老师聊一聊，寻求帮助和指导。这种融洽的师生关系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语法词汇变得生动有趣，也使我们艰苦的学习生活变得温馨柔和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对那些老师还充满了浓浓的感激之情。

196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当时，自卫反击战在中印边境打响了，我和其他男同学一样都积极报名申请到西藏战场上去，从事教育战俘的工作。但是综合考虑到我思想、学习等各方面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在“二赶四”中的优异成绩，学校要求我留校做英语老师。于是，我便走上了教学岗位，站在三尺讲台上，开始我所热爱的英语教育工作。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认真授课之外，还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或者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时也不放弃。大家知道，1966年开始，全国上下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关掉了，学生也不再正常上课，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还记得我们的系主任和一些老教授被扣上“崇洋媚外”、“反动权威”、“里通外国”的帽子，拉到台上去“坐飞机”（胳膊被拧到后面，头埋得低低的），接受造反派“口诛笔伐”式的批斗。我作为教研室负责人，也被拉去站在后排陪斗。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坚持学习英语。白天在台上背着手，低着头听那些造反派读“大字报”或其他“控诉”材料时，自己试着用英语把部分材料内容翻译一下，练练翻译技巧；晚上回去挤时间听听Radio Beijing，以使自己同英语保持接触，免得把语言功底荒废掉。后来，按中央指示各地纷纷成立了干校，让干部通过劳动再学习。我和其他一些老师便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的“五七”干校，一边劳动学习一边进行教学。还记得那时劳动很辛苦：白天到山上铲石头，从火车上运石灰，有时也到水田里插秧。我们这些文弱书生硬是自己动手，在一片荒芜之地上盖好了一排排宿舍和食堂，挖出了池塘和水井，开辟出稻田和菜地。但是，高强度

的体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往往晚上到食堂给学生上课时，累得简直都要散架了，可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一些老同事追忆旧事时还会打趣说，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符合孟子“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要求，一方面锻炼了身体，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我看来，在凤阳边劳动边教学的日子里，我充分体会到了教学和劳动的种种酸甜苦辣。虽然当时教学条件较差，但那些学生质朴好学，令人感动。而当年在池塘捞鱼捉蟹和田边收割水稻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可惜听今年春天到凤阳故地重游的一些老师说，那时开出的稻田和养鱼的池塘已经被一大堆废石料覆盖，旧日的稻香鱼肥、轻风绿野已经不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1979年，我国开始向国外派出第一批公派访问学者。经过层层选拔考试，我幸运地获得了去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访学的机会。这所学校位于风光旖旎、美丽如画的惠灵顿市中心。大家知道，惠灵顿作为新西兰首都，富有浓郁的海湾风情和文化氛围。市区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亚历山大坦博图书馆等设施先进，藏书丰富，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大学1897年通过议会法案成立，当时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纪念，所以这所大学以她的名字命名。我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院英语系访学，这个学院的教师培训项目在国际上久负盛名。数年来，有90多个国家的学生或老师到这里访学或进行学术交流。我主要进行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等方面的学习，和其他学生一样注册、听课、写论文、修学分。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理论方面的著作，我好像一个去赶海的孩子突然看到许多美丽的贝壳一样，欣喜之余也觉得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选择。而了解这些贝壳的独特魅力，并把他们组成美丽的图案也需要花费很大气力。首先是那些术语就很难透彻理解。第一次听教授们谈到interlanguage, fossilization, contrastiv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learning style, anxiety等词语时觉得一头雾水；而阅读专业理论书籍时，也需要反复思考才能理解其内涵。有时看书看得久了，便觉得头晕脑胀，不得不出去在校园里走上一圈，稍微放松一下再接着读。我自大学读书时就坚持记读书笔记，写读书报告，在维多利亚大学学习时也是如此。读书时我总是将不明白的地方划出来，去咨询以英语为本族语的同学或老师；或者将自己对某些理论或观点的看法写成读书报告，拿去请教那些教授。学院里的教授们经验丰富、各有建树。他们总是认真评阅，就文章的观

点、结构、语法、词汇等提出修改意见，让我受益匪浅。其次是进行实地考察。因为在国内主要从事教学实践活动，没有系统地学习语言研究方法，所以初次作调查时颇费了半天周折。记得当时修社会语言学课时，教授要求就某一论题进行调查。我当时选定了“英语附加问句”和“男女性别差异”两个题目。作附加问句调查时主要选取日常谈话等非正式场合；而男女性别差异方面分别选取了男女大学生、职员和售货员等进行访谈。当时我们几个同学走在这个现代化都市里，四处逡巡，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向被访谈者解释调查目的时，我心中忐忑不安，担心被拒绝。好在听明来意之后，这些被采访者都比较配合。就这样我们先后录了朋友闲谈、小学生讨论等场景；发放并回收了一些调查问卷；同时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后来我把调查结果整理成文，作为学期论文交上，得了个“A”。这激励我更加刻苦勤奋地学习。

在国外留学，可以有机会读到许多在国内读不到的书，看到最新的学术期刊，听一些有创新观点的讲座，参与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论坛。记得当时我学习非常紧张，整日里在图书馆、教室和演讲大厅之间穿梭，忙于读书讨论。那时的书虽然不太昂贵，但是我们的生活费比较低，所以只好尽量省出钱来买书或复印资料。为了获得更多的鲜活的语言资料，在漫步市区或校园时我随时留意广告、商标、路标、通知等文字，倾听不同场合中人们的谈话，碰到有用的或者自己没有见过的表达方式，就赶快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并且反复阅读，使自己能够熟悉这些地道的用法。就这样处处留心，认真苦读，我不仅以优异成绩拿到了语言学硕士学位，还积累了整整几箱子的书和笔记，撰写了数篇学术论文，这为我今后的教学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材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1981年，在新西兰访学的三年时光短暂而又漫长。之所以短暂是因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这一领域内容丰富，三年时间不能穷尽其研究精髓。而作为第一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我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珍惜这个机会，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并应用到我国的外语教育中去，为祖国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外语人才，所以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深造。求学生涯之所以漫长是因为毕竟身在异国他乡，饮食、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不太习惯；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总是萦绕心中，愈久愈浓。那时我的生活比较艰苦，每个月的零用钱只有25块新西兰元，买点书、复印点资料后几乎不剩什么钱了。一来没钱，二来国内当时的通

讯也不发达，所以三年内我没有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只能鸿雁传书，通过两周一封的航空信保持联系。“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中秋、元旦或春节时，我们这些远在异乡的游子便聚在一起包包云吞，听听评弹，聊聊国事家事，交流一下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和歉疚之情。中国有句古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当时我们国家还比较贫穷，而我们却以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骄傲。在与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交往时，我们这些访学的学者坚信祖国总会发展壮大，祖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而那些老师和同学听了我们的介绍后，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表示出尊重钦佩之情。我一直认为，爱国是外语人才的基本素质。说到底，一个连自己国家都不热爱的人也很难赢得他人的尊重。

自1981年回国至今，我一直从事英语教育和改革的工作。1985年我开始给研究生上课，1990年开始给博士生授课。多年来除了认真备课，完成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授课任务之外，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我还先后进行了“听说领先试点”、“英语专业大纲编写”、“分级教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等不同的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这其中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个中甘苦绝非几句话可以言尽的。

二、漫漫改革程 历尽甘与苦

自1962年留校教书，迄今为止已40多年了。其间我教了不同层次的很多课型，如精读、阅读、听力、口语、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社会语言学等。虽不能说桃李遍天下，但全国各地、不同行业（尤其是与外语有关的教学科研单位）基本上都有我教过的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多年的教书生涯让我切实感到教学不能局限于“教”，而应该在“学”的基础上“改”。换句话说，就是教学不能因循守旧，固守传统，而应该以一定的教学理论为依据，根据社会需求不断进行创新改革，探索培养外语人才的理念、模式和策略。

我最早参与的教改项目是1964年初进行的听说领先试点。大家知道，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1960年中央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1961年9月又公布了《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1963—1964年国家进入全面调整、恢复时期，外语教学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和语言实践能力。上海外国语学院率先试点，委托我这个刚刚工作不到两年的年轻人带头进行教改试点。我当时任英语系基础教研室主任，教授精读课。一

般说来，精读课是“重头戏”，课时多、备课量大。我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跟教研室其他老师一起摸索，多方搜集英语材料，咨询经验丰富的专家，同时自己编写讲义，在试点班学生中试用并随时了解他们的反馈意见，及时进行修改并应用到教学中去。常常是几个老师为了一个词、一种用法、一篇课文讨论得面红耳赤，争论不下。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法在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方面存在局限性；而如果坚持“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原则，在课堂上让学生多进行英语对话、角色扮演等活动，就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同时，我们在教学中还下意识地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利用对比结果指导教学。例如，基础阶段对学生进行纠音训练时，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汉语中没有这两个音，学生容易产生发音错误，于是我们就对其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练习。现在想来，当时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但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做法还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对比分析和行为主义的研究成果。经过一年的试点，学生的听说能力得到很大提高。1965年上半年我们这个试点项目面向全国进行示范教学，受到各高校老师的欢迎和好评。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教学法的改革，我也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再学习去了。

我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外语教育课题研究是第一部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制定。早在1951年6月，教育部就召开了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要求各类院校修订教学计划，制订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后来又分别于1953年在青岛，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座谈会，要求各主干课程（如英语、英语语法、英国史、英国文学史、外国文学、语言学、英国语言史等）在两三年内制定教学大纲，但从1957年开始，这些工作都搁浅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英语专业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79年4月，教育部分别下达了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综合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和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的试行草案，对于规范各类高校英语教学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还下发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践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对教学能力要求、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方法、考查和考试等方面做出规定。这一教学大纲后来在1980年青岛会议后修订为“青岛大纲”，内容更趋合理、科学。在“青岛大纲”试行两年后，教育部于1982年12月在上海及时召开了相关讨论会。当时我刚从新西兰访学回来，也参与了这次讨论。与会的有12所外语院校的同仁，大家一致认为“青岛大